

黎新农 (金陵协和神学院)

从旧约正典的形成史 来看合宜的圣经观(三)

《圣文集》的编辑与形成及以色列民灵命成长的关系。希伯来圣经分作三大部分,按体裁、内容和成为正典的先后,分别是托拉(五经)、先知书和圣文集。其中圣文集的书卷被纳入正典的时间最晚,但这并不表明其内容和来源一定很晚。比如《箴言》中就有许多很古老的乡间俗语、警训,其来源甚至比成文的律法更早。圣文集中许多书卷的编写和形成,很典型地说明了以色列民在上主的带领下反思历史,重新认识自己身份的过程。因为圣文集书卷很多,我们只能粗略地举例说明。《圣文集》中,《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又被称作“智慧书”,其编纂和整理,反映了属上帝的人如何从上帝的创造与主权以及个人的经验看待人生和世界,这样一种灵命反思。《诗篇》和《雅歌》是以饱满的感情描述上帝与人的关系。“编年史家”的著作:“圣经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圣经的监护人。教会刚强时,圣经的信息就先锋万丈,教会病弱时,圣经就因被忽略而遭腐蚀,人们对圣经的看法,正反映出教会的背景,这已成了不变的定律”。同样,人们对圣经中历史的看法,也决定着人们对上帝在历史中的救赎和创造之功的认识程度。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旧约历史学观。总的来说,圣经,特别是旧约各卷,都被纳入一个历史的框架中。

所以我们要特别研究圣经中的史学书卷,这就是申命史家的史著和编年史家的史著。这种研究,不同于以收集史料为主,准确报道历史事件的“希伯来民族史”。而是研究圣经作者的史学观或历史观。

先知书被纳入历史框架,其自身也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智慧文学,也被纳入历史框架之中:约伯记描述为远古近东一个义人的故事;箴言:所罗门的发明;传道书:所罗门的忏悔录。“历史是主观的”。所以在史家的笔下,写下来的“历史”,均经历了事件

的选择,而形成最后的编辑形式;编者的观点与立场,是关键因素,——编者总是受自己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溶入史籍的编条中。

这样看来,“申命派史书”(前先知书)有其特殊的神学观和历史观,并受被掳大环境的影响;编年史家的史书,有其特殊的神学观和历史观,并受回归后的以色列是以犹大为中心的宗教社团这个环境的影响,且以反北方撒玛利亚人为要旨。

《旧约》的书卷,半数以上都采用了史书形式,其余大多也通过某种渠道与历史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要了解圣经涉及历史的程度,就要了解《旧约》和《新约》作者们的基本信仰,即他们的神——古代以色列、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介入历史、按他们自己的计划为人类安排各种事件的神。

因此,研究圣经必须研究历史——一部非常特殊的历史。圣经的作者常以历史方式抒发己见,即常借讲故事,阐述事件和人物,传递宗教信息。我们必须以作者们的思维模式熟知希伯来人的全部历史。圣经作者讲述过去的故事,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讨论现在——当然是他们的现在。——对过去的材料加些选择,再依照他们所记载的当时听众的需要进行改写。这一条规律,适用于圣经的几乎所有历史记载。申命派史家的作品如此,如《士师记》等,下文着重叙述的编年历史家的著作亦复如此。圣经历史的作者,为忠于目的而写作,不像现代史学是为“忠于事实”而写作。今日读圣经的人当作历史书看的经卷,当日的作者却不是为写历史而动笔,而是针对他们的读者,来传达时代的灵粮而写作的。《历代志上下》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来是合成一卷的,且在文章上有相同的词语、风格和层次,在内容上,同样注重祭书刊号和利未人,律法和耶路撒冷圣殿,大卫的主统

和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整体性，因此，这四卷书是来自同一集团的作者，圣经学者通常用“编年史作者”称呼之。犹太人自俘虏囚归回后，时代好像不那么吸引人去写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这个时代，任何有关历史的兴趣，如果这种兴趣存在的话，那也是指向早已过去的时光，仅存的关于那个时代同时的报道，也是权威的报道，在那时的先知书中可以发现。但在这个时代仍有值得一提的历史作品和对历史的努力，这就是“编年史家”，他们大约活跃于主前300年左右，或稍晚的年代。在关注犹太教在此前后的发展历史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圣地在波斯时期的一些情况，即犹太人的生活情景。这段历史时期，是从居鲁士（古列，Cyrus）的兴起直到亚历山大大帝的称霸（332B.C）。圣经中有关波斯时代的历史记录，是两本很少有人去研读的书卷：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但这两卷书的历史跨度仅是这段历史的一半不到。学者公认，在第二以赛亚激动人心的诗篇之后，（第二以赛亚对回归抱有极大热情和期望），相形之一，这本卷书之叙述显得虎头蛇尾。这有点像从高层建筑一下子被掷于泥地。当然，这段犹太教的历史，在以色列史中占有重要一章，它的重要性，远远过于通常能够意识到的，没有这段历史，我们将不能承继属灵的遗产，这些属灵遗产深深影响的西方世界的文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犹太人的挣扎和努力，特别是编年史家的记录——他们是优秀的神学家的发现，我们会预料，犹太教、犹太族很可能会销声匿迹，基督教也就无从说起了。

《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是这一时期祭司们编写的犹太国通史，其中以大卫为中心，上溯其列祖的谱系，下及其子孙执政的情况，对北朝以色列则极少叙述，不像《列王纪上下》那样兼述南北两朝，《历代志》引用了《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但删去了很多史料，如：大卫在朝时的丑闻被删去，因其有损大卫形象；所罗门杀人，许多人反叛他的事被删去，因其有损形象；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在北朝的活动被删去，是因编年史家无视北朝的偏见。原因：1、此时回归甫定，犹太四面受敌，祭司盼望回复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荣光；2、除却政治原因，更出于宗教原因：宗派主义，认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中心，不承认撒玛利亚的殿也是中心，因此南北祭司对立……直到纽约时代。王下25:27载犹太逊位王约雅斤在巴比伦的故事。自此，“申命派史家”的笔嘎然而止，而故事则由“历代史家”继续下去——虽然西派历史处境不同，神学的侧重点也不同。

申命记历史最后一件事（王下25:27及下文），传达了一个有希望的讯息。约雅斤只在耶路撒冷作王三

个月，然后便被掳作监犯三十六年，但他终于获释，且也比其他的王得宠，在其中获得尊荣的地位：叙事的意义是降卑接着晋升——不久其他人也要喜乐地走出去，平平安安地蒙导引回归圣地。这个故事，由编年史家的《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接续，这四本书，一般认为写于主前四世纪，但也有更晚的说法。这间接说明，“编年史书”引用了圣经其他书卷的材料。在“编年式史书”的开始，编纂者先复述到主前一千年的事件，主要是家谱形式。第一章的材料来自创世记第五、十、十一、二十五及三十六章；第二章总括了创世记三十五、三十八、四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和《路得记》第四章的内容，并如上不明中源的其他名字。

编年史家有时会一字一句地接受《撒母耳记》到《列王纪》的信息，但有时选择或改变古时的记录——这完全是依照他自己观点与属灵看见而定。我们可以说编年史家原原本本地是一个重新诠释历史者。他选择那些可以浓墨重彩地发扬祭司传统的材料。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他所处理的是一段长达600年的历史（主前11世纪至主前5世纪）。不可避免地要权衡他所拥有的材料。很明显地，他不可能将每件事都囊括进去。他作一番筛选加工，完全是按照他的神学观点而定——是为了宣扬一些特殊的教义——而不是照我们的观点而写。

编年史家重新解释历史，他统筹全盘的观念是：以色列被称作一个“教会”，一个敬拜上帝的团体。更广泛地说，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种类”（这与出19:6的表述一致），一个人的一生，必须“圣仪化”或是一场神圣的崇拜。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个团体在圣殿中得以凝聚。在那里，祭司特别是利未人可以有一个在敬拜活动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所以，对祭仪的兴趣，是编年史家一个主要的关怀，这淋漓尽致地表现在编年史著作之中。实际上，编年史著作将中心和重点放在记叙圣城作为敬拜中心的历史上。大卫是主角——是神圣团契中的首要人物。相形之下，在申命史家的《撒母耳记》至《列王纪》中，大卫表现为一个政治的首脑，一位颇具人性的人，一位既有大的勇力又有人的软弱的男子，因而大受其民拥戴喜爱，尊为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以色列王。但编年史家却对大卫的政治身份不太感兴趣，因为编年史家写作其史著时，以色列已不再成其为一个国家，那些政治幻想、复国之梦已被回归后的现实冷却了。所以，他强调大卫之约（撒下7章比较代上17章），但对编年史家来说，大卫首先是一位组织以色列民成为一个敬拜团体的人：如：大卫，缔造耶路撒冷成为宗教的首都，成为“圣城”；大卫，亲聆雅威指导，预备建造

圣殿(代上28:19); 大卫, 组织圣殿的音乐崇拜, 指定利未人负责此事工; 编年史家用教会的圣袍包装大卫——这位凡人。所以, 编年史家, 隐大卫之恶而扬大卫宗教之善。如大卫的谋杀罪, 大卫之子押沙龙的叛乱, 及其他不光彩的事, 一概略去; 但是致力描绘大卫想建圣殿之梦(代上28-29章), 让大卫说出旧约中最美好的祷词(代上29:10-19), 没有人比得上编年史家更急切地给大卫头上绘以神圣光环。大卫对“教会”的兴趣, 被淋漓尽致地描绘: 他将约柜移至耶路撒冷; 购买亚劳拿之田地备圣殿之基; 大卫建圣殿音乐崇拜之事工, 成为以色列这种音乐崇拜传统之发端; 他是竖琴之声中的祷告者(参撒上16:14-23; 摩6:5); 他是优秀的“哀歌”作家, 诗人, 如他哀悼扫罗和约拿单的“哀歌”(撒下1:17-27); 大卫是一位音乐家兼诗人, 后代以色列传统将“诗篇”归功于大卫, 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 诗篇中有圣诗, 哀歌, 呼求之声和各种诗歌, 不尽是大卫之作。编年史家声言, 大卫对以色列的崇拜作了革新, 特别是其音乐崇拜(代上23-27), 实际上, 这是按照回归后(后被掳期)的祭司派犹太教的兴趣, 把大卫描绘成一幅教会成员的形象。编年史家描绘的以色列史, 是一部自大卫启端并发扬光大的崇拜团体的历史。他专于大卫王朝的传统, 略去北国, 扫罗受膏也一带而过。他认为北国之败, 在于耶罗波安开始的不断的偶像崇拜, 故上主大大降罚于北国。北国, 从崇拜团体中被抹去。南国之败亦由于此, 大卫之声音(代上22:5): 耶路撒冷的圣殿, 将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代上2:25)。这个理念, 在编年史家的笔下实现于《以斯拉和尼希米记》。他告诉我们, 当时统一万国的居鲁士(Cyrus)大帝发出敕令, 使虔诚的犹太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并立即建起一个圣坛, 后来又重建圣殿。但他们在此期间受到外邦人的恐吓, 这些人曾参与了毁坏第一圣殿的事。所以下一步, 按照编年史家的记述, 以斯拉携带摩西律法以祭司身份开始宗教改革。目的在于维系以色列这个团体的圣洁性。稍后, 如果我们按照编年史家的顺序, 知道尼希米作为波斯的官员回到耶京, 督导重建城墙, 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和宗教的改革。所以, 以色列从被掳回归, 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 而是作为一个宗教团体而存在。这个记录, 描绘了回归后的以色列的历史状况。编年史家的意图, 在于指出以色列的这种可喜变化, 不但是政治上的责任而且是回复自大卫以来的犹太教特色。这两本书告诉我们有关以色列回归后的历史故事, 从主前538年, 到尼希米第二次作犹太地的官长末期(即接近主前400年)。原来是一卷书的以斯拉和尼希米记, 在主后第4世纪, 被耶柔米分成两本书, 这就是在那

部被公认为天主教权威译本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里的情形。在此之前, 早期的希伯来圣经及其希腊译本中, 这两本书都被视为一卷书。在基督教的早期, 犹太教学者中的马索拉派(Masoretes), 为珍存犹太教圣经的标准版本(马索拉本的经文或传统本), 他们计算核对经文的每一个单词, 以免确认不会有一个词被移走或误加入经文之中。在计算的基础上, 他们声明以斯拉和尼希米记最中间的一节是尼希米记3章32节。这当然不是现今基督徒的圣经中“尼希米记”的中间一节, 而是拉比们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当成一卷计算的结果。这样, 当我们将以斯拉和尼希米记当作一卷书看待时, 我们就会明白现在的情况: 关于以斯拉的故事, 部分出现于现在的以斯拉记, 而另一部分则出于现在的尼希米记(尼7:23至10:39)。更有进者, 在原初的希伯来文中, 以斯拉和尼希米记原是一大卷历史著作的一部分, 这一大卷书的第一部分, 是现在的历代志上下。这一大卷书由相同的神学观点统摄, 以相同的样式写作, 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 无疑是出自单一作者之手, 所以被称为“编者史作者”。他的身份当未明了。大体上, 他肯定是圣殿人员之一, 与利未人一样, 是祭司之一。《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本源上是“历代志作者”作品的总结部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历代志下的结尾, 正好是以斯拉记的开始, 过程是这样的: 当历代志卷轴被切下, 以与以斯拉——尼希米记分离时, 此作品的末尾一栏的余留被加在现在的正典的《以斯拉记》之中。《历代志上下》其实是稍后才变为正典的。从以斯拉——尼希米记被切下的那部分是被用作或复制作“重复信息”的, 在希伯来圣经中, 以斯拉——尼希米记是置于历代志上下前面的。更进一步说, 自到中世纪, 在希伯来圣经的抄卷中《以斯拉和尼希米记》仍被当作一卷书。“尼希米回忆录”的记载载于尼希米



希伯来文作记忆
农历四季的简单帮助,
这是在基色所发现, 约
在主前 900 年的遗物。

记一至七章之中,另外第十章中也有些材料独立地单独记载“尼希米”的改革运动(不属以斯拉的改革运动)。但研究者对以斯拉和尼希米两人的改革运动之前后和所相继及变化,学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记之始作编纂,乃在犹太人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亚历山大死,犹太人被“南王”——埃及王统治,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记均编纂于此时,且原来是由一班作者写的一卷书。学者认为,尼希米是从主前445年起回耶京,但《尼希米记》叙述历史直到《尼希米记》的编著者当代,指出亚杜押为大祭司之事(亚力山大大帝时期)。这说明,包括《尼希米记》在内的“编年史家”的著作,最后编订为我们现在读的圣经中的样式,是比较晚的事。编年史家是以史为鉴,在子民这个属灵团契需要时代灵粮的时候,在上帝的灵的带领下重述历史,从其中看到上帝的带领,看出属灵的原则和规律来,以指教子民团契。

“智慧书”的编辑形成过程对我们的启发:因为以《箴言》为代表的智慧文学编写者对上帝、对世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独特的感受和看法,使我们信主的人能够在上主面前得着特别的智慧,使我们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修身为入,与同胞相处,活出上帝子民的样式来,所以很多基督徒喜欢读智慧文学,还有人将智慧书推荐给那些钦佩圣经真理的人去读,这说明智慧书的道理和智慧是每个人都需要明白的。研读智慧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让我们这些已经承受生命之恩的人,学会在现实的复杂琐碎的生活中如何处事为人,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来。智慧书卷中智慧人对世界的平衡、合宜的看法,特别是其中《箴言》的编纂、整理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旧约圣经,树立合宜的圣经观,进而充分理解和参与今日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因为以《箴言》为代表智慧书的神学,主要是从上帝的创造看世界,强调人的责任和能力,也就是上帝命令人能够做到的事,人就不要把责任推给上帝。所以,《箴言》教导我们在救赎和创造两方面的恩典上保持一种平衡的看法,这对基督徒是很有帮助的。这也很现实地指出以色列民实际的社会生活情形。他们并不是单单像我们在《摩西五经》中看到的那样,过着一种刀兵相见的军事化生活,而是有着与周围的民族一样的日常生活。因为上帝造就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并非把他们放在真空当中,而是放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如此才显出子民特有的智慧和良善来。智慧教师就是很认真地观察社会,很认真地生活的。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不是一旦信主,这个世界和周围的环境

就立即变得空明澄净,凡事遂心。我们自身的修养仍需要靠生活的磨练去提高。这就需要靠经验和智慧,去战胜愚昧,去分辨是非。尤其在现今的经济化社会中,我们个人和我们的子女,更需要像智慧教师那样谨慎而快乐地生活。《箴言》冠以所罗门之名,但却是希西家王年间搜集和整理的。其中还编辑了“智慧人的言语”和两个外邦人的箴言集。这说明,上帝的子民从来拒绝任何形式的“教外”的真善美与智慧,因为这一切的源头,是来自上帝。《传道书》其实是一位智慧大师采用所罗门的经历和口气,写下的对人生的短暂和软弱的慨叹,引导人归向创造主。而《约伯记》则是将以色列和近东的人们自古以来对苦难问题的种种疑问和反思的大讨论,巧妙地嵌入关于约伯的古老故事之中,指出惟有造天地的主才是我们生命最终的依靠和答案。

《诗篇》冠以大卫的名字,但也有其他作者。比如第37篇,明显是被掳巴比伦后的一位被囚者伤心的诗。《雅歌》本是以色列民间表达婚恋情爱的诗歌,但却用来隐喻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爱。最有争议的,是《圣文集》中的《但以理书》的作者与编订时间。这本书是描写民族英雄和智者但以理的故事,颂扬上主的伟大历史计划和救恩,颂扬敬畏耶和華的智慧,属于启示文学。希伯来圣经的最后编订定型,学者认为是在主后90年的一次犹太学者的会议上。有些写得较晚的书卷,如《所罗门智训》和《便西拉智训》就没有被编入正典。所以新约作者在引述旧约经文时,根据的版本大多是七十子译本,但也可能有其他版本。但我们认为,任何经卷的写作、流传、编订,看似是人的工作,其实是上帝的灵的引领。只不过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口授笔录式,而是在及其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中,体贴上帝心意去完成的。希伯来圣经,记录和反映了子民灵命的挣扎和上帝的带领,反映了随着时代的演进子民神学思想的变迁,上帝默示了最初的写作者,也默示了此后的编订者。因为所谓神学,不只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人在历史中与上帝相遇的经历。我们想,这样的过程,不会削弱圣经正典的权威,反而会更加显示出上帝是一位愿意亲近人、在人类历史中行走的上帝。我们比较切合实际的圣经观也将由此建立。本文采用了近现代旧约研究的一些成果和说法,读者可按灵里的接受程度去阅读,去了解旧约正典的编辑形成历史。旧约正典编辑定型了,新约的曙光正从高天临到上帝的子民团契。新约正典的形成史,也反映了教会的灵命挣扎和成长历程。愿主在今日与中国教会同行。